



□ 吴小雪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崇礼尚廉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伦理道德资源、完备的社会行为规范和系统的修身立命思想，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这种文化通过源远流长的礼制、礼仪、礼俗得以传承和弘扬，而作为中华民族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春节则成为礼文化的重要缩影和廉文化的重要窗口。

—

中华民族在 50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形成了高尚的道德准则、完整的礼仪规范和优秀的传统美德，被世人称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自周天子制礼乐安天下以来，礼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词汇，在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不断重视与加强的过程中，礼文化如涓涓细流汨汨流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崇礼、学礼、守礼、行礼成为炎黄子孙的人生必修课。

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标识，其内涵极为丰富，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笼而统之地概括，礼至少涵盖了处理三个方面关系的法则：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则。如《礼记·礼运》篇有：“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因此“礼”顺承

天地万物之自然规律，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即信奉“天地之道”，追求“天人合一”，顺应自然规律以制礼。二是人与社会关系的法则。在社会层面，礼是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行为标准和评价标准，也是国家赖以运行的纲纪制度。荀子认为礼是法律总纲，也即礼是制定其他法律条文的准则和依据。关于礼作为社会准则的意义，司马迁认为，“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大意就是，按礼办事，就事事成功；不按礼办事，就诸事皆废。因此，礼约定社会行为之规范，追求人与社会的和谐共荣。三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法则。在微观层面，礼是个人修身立命的基础，依礼行事也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礼还明确个人角色定位，维系人伦关系。先秦儒家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纳为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五种角色，认为这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伦理关系，称为“五伦”。孟子认为，处理伦常关系的原则应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今天我们讲父慈子孝、上下和睦、琴瑟相和、尊老爱幼、言而有信就是这种礼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因此，礼明确修身立命之原则，追求人与人的和谐共处。

简单地说，礼的基本要求就是：遵守自然法则、社会道德、个人美德。其中，自然大道是根本，是先贤制礼的依据。社会道德和个人美德则

是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的运用。其最终所追求的是一种老有所安、壮有所用、幼有所养、各司其职、各得其乐的安定社会。

二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廉文化与礼文化一样占有重要地位。“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奢靡之始，危亡之渐”“公生明，廉生威”等古训都意在强调廉洁的重要性。

我们讲廉洁，内在地包含了廉与洁两个层面的含义。东汉著名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释说：“不受曰廉，不污曰洁。”也就是说不接受他人馈赠的钱财礼物，不让自己清白的人品受到玷污，就是廉洁。廉即清廉，就是不贪取不应得的钱财；洁即干净，就是指人生光明磊落的态度。廉洁作为一种个人美德强调勤俭节约，杜绝奢靡浪费。毛泽东提出的“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就是倡导节俭的美德。廉洁作为一种为政品德强调清廉自守、不贪不污。《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小宰》说：“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

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六字诀皆以廉为本，强调慎独慎微、勤政廉政。古代官吏的考核更是把“廉”放在首位，分别考核清（清廉）、政（政绩）、才（才能）、年（年龄）。在这种廉政文化教育下，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名留青史的清官廉吏。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任太史令时，拒收朝中最得势的将军李广利送来的珍贵玉璧，并教育女儿说，玉璧贵在无瑕，人也应如此。如果我收下这对玉璧，心灵上就会留下斑污，并要受制于人。清代廉吏于成龙“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死后遗物仅有一件粗丝袍、一双靴子、一根腰带、几斗米、几罐盐豉。被誉为“天下第一廉吏”。这些历史先贤都为今天的领导干部树立了廉政榜样。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要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要做到“三严三实”，一以贯之地包含了廉洁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风廉政建设，是广大干部群众始终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党的执政基础。新时代，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必须持之以恒正风肃

纪，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三

春节，是中国人最为重视的传统节日，也是崇礼尚廉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经过几千年历史涤荡，很多礼制、礼仪、礼俗都慢慢淡忘消失了，春节这一古老的礼俗却洗尽铅华，历久弥新。在追求速度和效率的快节奏生活下，春节成为中国人寻根祭祖、休憩心灵、联络感情的重要寄托。每年几亿人次的春运大潮记录着中国人独有的情感皈依，延续着厚重的崇礼尚廉文化传统。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春节是团聚欢庆、辞旧迎新、传承孝道的盛典。每到此时，远行的游子纷纷归家，洒扫庭除、祭拜祖先、燃放鞭炮、张灯结彩、走亲访友、拜年串门、互道祝福，到处洋溢着一番其乐融融的热闹景象，古老的礼文化在丰富多彩的年俗中得以传承。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每到节假日都发送廉政短信，提醒广大党员干部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廉洁自律。就是要让广大党员干部筑牢思想防线、自觉抵制以礼之外衣包裹的“糖衣炮弹”，过好廉洁关。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能否过好廉洁关，不仅是个人品质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不仅是纪律要求，更是党性体现。

1932 年，毛泽东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并在这里迎来了春节。腊月二十三，总务处的同志来慰问毛泽东，送来一个月的津贴费，还特意带来了几条纸烟。毛泽东深知纸烟来之不易，嘱咐总务处的同志说：“纸烟应该送到战士们的手里去，他们比我们艰苦得多！我这里还有不少旱烟叶子，用报纸卷着抽就蛮好了。”总务处的同志告诉毛泽东，我们红军反“围剿”胜利，缴获了敌人很多纸烟，战士们不缺烟抽。毛泽东幽默地说：“少抽点烟，不是更有利于健康吗？”总务处的同志见状只好把烟带回去了。这种慎独慎微的自我约束，充分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清廉自守的高尚品格。

总之，对于春节，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是其所承载的礼文化所具有的精神基因、情感记忆和灵魂归宿的内涵，还原其作为一种文化，浸润心灵、凝聚民心、促进和谐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把崇礼与尚廉紧密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宣传教育引导人民正确知礼、行礼，另一方面力倡勤俭、清廉，营造一种风清气正、情感浓郁、自然纯朴的节日氛围。唯此，才能让这一古老的习俗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家范》中的修身齐家思想

□ 丁万明

《家范》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家训著作，堪称齐家通鉴。《四库全书》评价这部书“节目备具，切于日用，简而不烦，实足为儒者治行之要”。习近平总书记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曾说：“司马光‘欲以身殉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于物淡然无所好’，‘恶衣菲食以终其身’。封建官吏尚能如此，我们无产阶级的干部何言不能！”习近平总书记引用的这几句话分别出自苏轼为司马光撰写的《司马温公行状》和《宋史司马光传》。

司马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同时代的欧阳修评价司马光“德行淳正，学术通明”，“说言嘉话，著于两朝”，“可谓社稷之臣也”。邵伯温评价他是“三代而下，宰相、学术、司马文正一人而已”。清代为司马光修年谱的顾栋高认为：“唯公忠厚质直，根于天性，学问所到，诚实金石。自少至老，沉密谨慎，因事合变，动无过差。故其文不事高奇，粥粥乎如菽粟之可以疗饥，参苓之可以已病。”

事实上，司马光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他不仅是名重千古的政治家，与司马迁交相辉映的史学家，还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礼学家。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司马光是宋元以后儒家伦理思想和家族文化建设的创始巨擘，被奉为儒学教化的典范。司马光在家训领域的著作以《家范》和《训俭示康》为代表，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司马光的家训思想体系。

《家范》又名《温公家范》，是继《颜氏家训》之后最有分量的家训名著。《家范》节录了儒家经典《周易》《大学》《孝经》《礼记》及各种史传所述礼教规矩，以其史学家特有的表达方式，通过大量历史人物的典型事例，论述齐家之道，对为人父母、子女、兄弟、夫妇所应遵守的伦理规范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家范》主张治家必以礼为先；推崇谦恭治家，尊贵集门；强调勤俭致富，仗义疏财；倡导“克己守礼”的家庭和睦之道。

《书仪》一书为朱熹所推崇，朱熹编著的《家礼》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民间的通用礼书，有一半以上文字出自《书仪》。司马光、朱熹所确定的

日用伦常和礼节制度，为宋元以后封建社会的家庭和家族组织确定了一套长幼有序、尊卑有等的传统礼教生活方式，使人们的言行举止各从规矩，冠婚丧祭皆有定式。

司马光的修身思想集中体现在为其子司马康所写的《训俭示康》一文中。“俭”是这篇文章的题眼，“惟俭养德”是司马光推崇的修身法门。司马光引用古人的话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侈则多欲。”有地位的人如果多贪欲，就会贪图富贵，不走正路，最终招致祸患；没有地位的人如果多贪欲，就会多方营求，随意浪费，最终败家丧身。所以说奢侈是罪中之罪。“俭”不仅是一个人对待物质生活的态度，更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功与失败。作为政治家、史学家的司马光以他深邃的政治眼光，敏感地洞察到了这个真理。

司马光为人首先强调的是“诚”

“诚”是儒家的核心德目之一。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作“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用儒家的话来说就是“不诚无物”。“诚”是“三观”的前提，决定了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司马光在 5 岁的时候就接受了守“诚”的一课。有一天，5 岁的司马光想吃青皮核桃，请姐姐帮他剥皮。姐姐怎么也剥不开，有事便放下走了。家中的女仆把青核桃在开水中烫了一下就很容易将皮剥开了。姐姐回来后很诧异，问是谁剥开的。年幼的司马光随口说是自己剥开的。这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小谎，但司马光的父亲得知实情后大怒，责问司马光道：“小子何得漫语？”这一严格的家教课影响了司马光一生，从此之后他一直把守“诚”作为立身之本。他自己说：“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司马光的学生刘安世向他请教治学之要。司马光回答说，应当是诚吧！又问从何处入手，司马光说：“自不妄语始。”

史书上用“诚心自然，天下敬信”八个字评价司马光一生的德行。司马光的老家包括他的第二故乡的老百姓都被他的德行感化，“师其学，



法其俭”，老百姓一旦做了不好的事，人们就会说“君实得无知之乎？”君实是司马光的字，意思是说你做这么不好的事，怎么能对得起司马光呢？可见，那个时代的司马光是道德标杆。

司马光修身一以贯之的就是“俭”

司马光在给其子司马康所写的家训《训俭示康》中说：“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为病。”这是他的生活方式，更关乎其价值取向。俭朴是司马氏家族世代传承的家风。司马光自奉节俭，日常生活之中，“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衣帛”。司马光的好友范镇曾送给他一床布衾作为礼物，司马光非常喜欢。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写了一篇著名的《布衾铭》，劝人以俭为德，以奢为戒。司马光“爱其文义”，将《布衾铭》工工整整地写在范镇送给自己的布衾上，嘱咐家人，自己去世时也要盖这床布衾。

司马光不像当时的官僚那样蝇营狗苟追名逐利，他在洛阳营建的独乐园虽然是一代名园，但实际上既狭又简陋，仅足以庇风挡雨。洛阳夏天酷热，司马光为了避暑只好在地下打洞。而北京留守王拱辰在其家乡洛阳

有极为华丽奢侈的园宅、楼阁，时人戏云：“王家钻天，司马家入地。”独乐园只因有了司马光人品之涵养而独树一帜，别具一格。司马光官俸优渥，但他把这些钱财都接济了别人。最终家中仅有田三顷，夫人去世之后，无钱安葬，只得把仅有的田产变卖作丧葬费。终其一生，司马光“恶衣菲食”，吃得差，穿得差。苏轼盖棺论定称他“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是其不谋财利的真实写照。

司马光齐家的核心理念是“礼”

司马光认为“正家而天下定矣”。意思是说，在家庭里，每个家庭成员都按照自己的家庭角色恪守礼法，家道就正了。

司马光自己就是齐家楷模。《宋史司马光传》说他“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司马光对自己的父亲非常孝敬，为了就近照顾父亲，甚至主动放弃升迁的机会。司马光不仅自己孝亲，也劝自己的侄儿司马富辞官归里，侍养尊亲。如今上海博物馆所藏司马光手书《真书宁州帖》讲的就是这件事。司马光的兄长司马旦比司马光大十多岁，司马光晚年对自己年将八十的兄长“奉之如严

父，保之如婴儿”，对待兄长像孝敬父亲一样尽心，呵护兄长像呵护婴儿一样精心。司马光的母亲和父亲相继而亡，他接连服丧五年。由于他完全恪守礼法，以至于“执丧累年，毁瘠如礼”，把自己的身体都快拖垮了。真正做到了孔子所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司马光的两个亲生儿子都过早夭折，司马康是过继族人的儿子。司马康受司马光的言传身教，“为人廉洁，口不言财”。司马光去世，司马康按照礼法“治丧皆用《礼经》家法，不为世俗事”。居丧期间“居庐蔬食，寝于地”，由于吃得差，又受凉，遂得腹疾。亲戚劝他破例吃肉补充营养，但他不肯悖礼破例，落下病根，只活了 41 岁便去世了。司马康去世时，其子司马植尚幼，高太后悯其孤幼，宰相吕大防出面找到司马康生前好友邵伯温托孤。邵伯温当时任西京国子监教授，说：“温公之孙，大谏之子，贤愚在天下，可畏也。”便把司马植接到自家来培养。

司马光立身以诚、俭以养德、以礼齐家的修身治家家训思想，不仅是司马氏一家的治家规范，而且是纯厚乡俗、匡正民风的“训俗之规”，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在今天仍然值得鉴借。

（作者系河北省委党校教授）

